

● 翻译研究丛书

英汉 文学翻译 探索

黄雨石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 翻译研究丛书 ● 黄雨石 著

英汉文学翻译探索

陕西人民出版社

翻译研究丛书
英汉文学翻译探索

黄雨石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4.875印张 5插页 300千字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900

ISBN 7—224—00061—2/H·1

定价：(平)4.10元

编 后 记

《写作参考资料》是为了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写作课教学需要，按照川、滇、黔、湘、桂、赣六省（区）协作编写的《写作知识》体例选编的。参加工作的有西南师院、四川师院、南充师院、重庆师院、西南民院、昆明师院、云南民院、贵阳师院、贵州民院、湖南师院、广西师院、江西师院等中文系写作课的同志。

本书选编的原则是：对教学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古今中外作家写作经验谈，对某一写作问题有深入见解的，但以中国为主，以现代为主，以名家为主；尽可能选用全篇，在特殊情况下才采用摘录；容易找到的一般不多选，不容易找到而又较适用的则选入。

各院校分工选编时，多系根据原文转抄的，难免有错落之处。望使用本书的同志在引文时，务必以原文为主。

由于时间仓促，经验缺乏，水平有限，会有不少缺点、错误，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 长沙

17247/08

编者的话

随着我国奉行对外开放的政策，我国在国际范围内的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广泛，翻译事业蓬勃发展，各种译著不断问世。我们不仅译介了大量的外国文学名著、科技著作和其他各门学科的著述，也将本国的古今文学佳作和文、理科读物译成多种文字向国外传播。为此，我们编辑一套翻译研究丛书，旨在总结老一辈翻译家多年来积累的经验，扶植中、青年译者迅速成长，探索新的翻译理论和技巧、提高中外译文的质量。本套丛书内容包括各种语种的翻译基础理论和技巧的研究、翻译史及译文的比较研究、诗歌翻译研究、科技翻译研究及其他各种文体的翻译研究。敬希老一辈的翻译家、中青年翻译工作者及长期从事翻译教学与研究的教师和学者为我们撰稿，欢迎广大读者对这套读物提出批评意见。

上 编

引 言

一、讲几句心里话

由于职务关系，三十多年来一直都干一点以文学作品为主的英汉翻译和校订工作。也不免读到和听到过许多有关翻译理论的议论，自己有时也曾反复思考这一问题。但结论却往往只是：一位译者如果具有第一流的外文修养，又具有第一流的中文写作能力，并有足够的知识，那只要略作些训练，他自然就能翻译出第一流的成品来。似乎并没有太多的理论好讲^①。

实在说，我这种想法可说至今依然未变。从这一点来看，笔者实在没有资格对翻译理论进行什么探索。

我现在所以大胆拿起笔来，实另有一方面的原因。那就是对于多年来我所听到或看到现在还正流行的许多观点——不管叫它翻译理论也好，或翻译技巧也好——自己一直颇有些不同的想法。那些观点有些我认为是不准确，不科学，或不正确的，有些我认为由于产生它的思想基础便十分错误，因而对初学翻译的人来说是害多利少，或是有害无益的。而

^①最近读到茅盾先生“译诗的一些意见”一文，其中谈到：“翻译本来全随译者手段的高低而分优劣，什么方法，什么原则，都是无用的废话……”（见罗新璋编《翻译论集》第348页）云云，我自然完全同意。

这些想法长期存在于心中，倒真使人有一种“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之感。

当然，我这里也不能不提到，真正促使我下决心拿起笔来的还是三联书店香港版刘潜之先生主编的《翻译论集》一书。这本书较全面地收集了自严复以来的许多翻译论文。我因偶然机会得到了这本书，使我感到我对我打算要谈的问题，更有所依傍了^①。

明白了这一点，读者对我这部书要写的内容自然已可以猜出大半了。剩下的一半则打算讲一点自己多年进行翻译工作的一点经验和体会，那显然更说不上是什么理论了。

所以这里的目的，第一，决不是专为要反对某些论点，立意要和某位名家在理论上进行论战；其次，更不是我自己打算提出一套新理论来，我什么理论也提不出。我的极其平凡而又简单的目的，只是想根据自己有限的一点经验，向有志于翻译一道的年轻朋友讲讲我自己对现在流行的一些翻译理论的看法，供他们参考，并对他们谈谈，要学好翻译应多注意哪些实际问题。

因此，本书将据此分为上、下两编，上编逐条讨论在翻译界较有影响的一些论点，特别是指出其中有哪些说法，尽管长期流传，实际并不可信，希望他们不要为之所误；下编则将逐条说明，在我看来，要搞好翻译必须注意哪些十分具体的实际问题，并列举出已出版的译作或翻译理论书籍中的一些译例，逐条分析其得失，以使他们对如何翻译为好能有

^①最近我又见到了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该书搜罗更为完备。虽然我见到这部书时本书的初稿早已全部写完，这新的《论集》对我的修订工作无疑将会有极大的帮助。

一个较明确的概念，并能初步掌握一个比较正确的方法。

但当然，所有这些都不过是我的主观愿望。至于结果如何，只能留待读者去作结论。也可能笔者完全力不从心，所谈实毫无价值，这本书也很快便被人遗忘，那自然正是该书所能遇到的最可悲的下场。但如果这里所讲多少还能接触到问题的实质，因而引起一些争论，甚至因此这本书一问世便成了众矢之的，那么它至少在推动翻译理论的争鸣，从而达到“真理愈辩愈明”的目的方面起了一点推波助澜的作用，那它的作者将仍会感到十分欣慰。

二、关于“文学翻译”一词的几句说明

究竟什么叫“文学翻译”，这里似应先简单解释几句。一般所谓“文学”当然仅指以小说、诗歌、戏剧等形式写成的作品而言（也称“文学作品”）；或者至多再加上文艺理论、文学史，还有文学家传记等等文学研究者所必须涉及的一些作品而已。但很显然，我们这里讲“文学翻译”，它所包括的范围却要比这个更广泛得多，几乎可以说，除了纯科技作品以外，其它一切需要使用“文学语言”的作品——诸如历史、哲学、一般传记、政论、演说等等——的翻译无不应包括在内。

举两个最简单的例子。菜谱可以不使用，或者说不一定必须使用文学语言，因为这类书的目的只是让人能照着它做出菜来就行了。比如我们自己写的菜谱中可以有这样的句子：“……可用油把鱼略煎一下。煎时，锅烧热下入油。把鱼两面蘸一些鸡蛋液，放入锅内……”（见《家庭常用菜100例》第48页）就这么两三句话，如果仔细加以研究，便

有许多不可解之处。怎么“煎时”才烧镬下油？“锅烧热下入油”是把锅往油里泡，还是把油往锅里倒？“把鱼两面蘸一些鸡蛋液”是一种什么样的动作？我们不是只能要么（用刷子）在鱼的两面抹上鸡蛋，要么（拿着鱼）让鱼两面都蘸上鸡蛋吗？所有这些都可以是从这段文字中无法得到肯定解答的问题。但是这却可能并不妨碍一位家庭主妇依照这菜谱来做这鱼（因为她们对这一行本来就很熟悉）。那么它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这当然不是说，科技翻译全可以这样对文字的通顺与否不加考虑，科技作品或科技翻译当然也应该尽可能把文字写得通顺流畅一些，以便于阅读。再说科技作品对精确性的要求往往比文学作品更甚。但是在翻译科技作品时，从文字方面来讲，我们仍觉得只要能懂也便行了——它并不迫切需要文采。

但是我们如果这样来对待文学或文学翻译，那可绝对不行的。这里我们且拿讲笑话来作个例子。同样一个笑话，能否讲得使听者觉得有趣或令人发笑，便全得看讲笑话人的“口才”如何。也就是说，这里就得要看讲的人是否善于使用文学语言了。比如，有一个据说是从明朝流传下来的“一字笑话”，说有一个名叫陈全的人幼时误入皇宫禁地，被太监抓住了。他向太监求饶，那太监知道他一向以善讲笑话闻名，便逼着他讲个“一字笑话”。他想了想说了个“屁”字。太监问他怎么讲，他说“放也由公公，不放也由公公。”于是那太监大笑着把他放了。我们且不论这故事是真是假，仅从说笑话的角度看，这里的“放也由公公，不放也由公公”一句却无疑是最理想的措词。如果只为表明这句话的基本涵义，我们当然还可以有很多种说法，比如说，“随

你爱放不放”，“放也在你，不放也在你”，“你愿意放就放，不愿意放就别放”，“放不放听你的”，“放也好，不放拉倒”等等等等。所有这些句子（当然还可以想出一些别的）尽管基本意思都可说与上句完全相同，但我们感到不论拿它们中的哪一句去替换原来的说法，便马上会觉得整个笑话大为减色，或甚至变得索然无味了。这是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按笑话中的具体环境和情景来说，只有原来的那句最为得体，而且恰到好处。而其它那些（有些甚至可能引起听话人的反感，那且不去说它了）则或者于情理欠通，或者与说话人身份不合，或者“口气”欠妥。

在讲明基本意思之外，还要让我们所使用的文字句句妥贴得体、恰到好处，这便是一切文学语言的共同要求。所谓“文采”必须以此为根本，文学语言的感人力量也首先来之于此。文学作品的翻译当然必须使用此种文学语言，文学以外的诸如历史、哲学、传记、政论等作品的翻译显然同样需要使用这种语言。至多我们只能说程度上也许略有些差别而已。

至于科技翻译，自然首先以明白为主，在文字方面的要求便不那么严格了。这便是我所理解的科技翻译与文学翻译的差异。所以，很显然我这里讲的“文学翻译”决非仅指文学作品的翻译而言，而实际应该说是包括除科技作品外的其它一切著作的翻译。

三、几个与此有关的问题

1. 这里所以要严格划分二者的界限，不仅是为了说明这里讲的只是文学翻译，同时也还为了讲清科技翻译决不包

括在本书所要讲的范围之内。因为科技翻译很可能确有它的一些特殊规律，而我对它实在毫无所知，不敢妄论。我特别想到，国外的科学工作者，在谈到翻译问题时，甚至有人公开提出：翻译工作者应该认为自己有责任“把原文的语法结构也翻译出来”，“to translate also the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这种说法在科技翻译中也许是可以成立的吧（不过，我想讲这话的人恐怕至少是对中文、日文等一类亚洲文字一无所知）。但不管怎样，如果我们对文学翻译也提出这种要求来，那就只能说纯属糊涂论调了。

2. 这里当然只限于讲英译汉的文学翻译问题。因为英、汉两种文字可以说完全没有“血缘”关系。发音问题不必说了，它们在语法结构等方面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因而这里所讲原则对同一语系的两种文字（比如英语、法语）之间的翻译来说可能并不适用。（至少是我不能武断肯定）。因此，这里所讲的一切都永远以英译汉为前提，至于对它种文字的互译来讲情况如何，则完全不在考虑之中。

汉译英和英译汉共同的地方可能更多一些，但它们也各有各的特点，不能混同，这里也就不讲了。

3. 诗歌虽说是正宗的文学，但诗的翻译，我认为几乎不可能按一般文学翻译的原则来进行。因此决定对这一问题“另案处理”，以全书的最后一章专门谈谈这一问题。而我这里要特别讲明的是：书中关于文学翻译的一般论述，至少在我自己看来，对诗的翻译是并不一定适用的。

另外，哲学的翻译，不管怎么说，首先有个专业问题，这里当然也无法谈了。

四、也作一点极简单的历史回顾

两个民族因语言不同，通过翻译进行接触的活动，无人知道究竟始于何时，但可以肯定在史前时期便已开始了。因为在人类早期度过的漫长岁月中，语言不同的部落总不可能始终都毫无交往。我国的《拾遗记》中提到汉孝惠帝二年“远国殊乡重译来贡”，《竹书纪年》则更谓在殷商成汤时期，汤“放桀于南巢”之后，“诸侯八译而来者千八百国”。那么，在我国开始翻译活动可谓相当早了。更有趣的是，这里讲的是“重译”，甚至是“八译”！如果这些记载属实，我们简直难于想象当时不知已有多么庞大的一支翻译队伍在进行工作了。而且我们恐怕还不能说，他们不过仅需要作些口译而已。因为既然是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免不了还会有些“国书”一类的文件需要笔译吧。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想到，唐代大诗人李白因为能识蛮书，偶然作了一次翻译，居然一直传为佳话，实在是有幸有不幸了。

不管怎样，翻译确是一门非常古老的艺术，这是没有疑问的。

当然，在我国查有实据的翻译工作，应说是始于佛经开始输入中国的东汉时期。其后直到隋唐两代，佛经的翻译始终没有停顿。特别到了唐太宗时期，在去“西天取经”的唐僧陈玄奘的主持下，在当时的国都长安弘福寺集中了大批精通汉、梵文经典和具有文学修养的僧徒，组成了历史上第一个查有实据的庞大的翻译机构，“佛经译场”。据记载，在参加工作的众多译者之间还作出了明确的分工，有些人专司“证义”，有些专司“缀文”，或“定字”，或“证梵语梵

文”。佛经译场存在了约五年时间，对于佛经的翻译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其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翻译活动似乎基本停止，一直到明朝天启年间西洋耶稣教会的传教士进入中国的时候才又活跃起来。这些教士除带进了许多宗教书籍外，为了取得中国人的信任，同时也带进了许多关于天文、历算、兵器、水利等等的科学书籍。于是便形成了一股翻译介绍外国科技知识的热潮。我们知道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原理”也便是这一时期传入中国的。这时期的翻译工作先是由一些通晓汉文的外国传教士担任（其中最主要的有来自意大利的利玛窦、熊三拔，来自德国的汤若望等人），后来一些中国的科学家（其中包括竺可桢先生称之为“近代科学先驱”的徐光启）也参与了这一工作。这一时期对外国科学书籍的译介，延续了一百多年之久，无疑对早期西洋科学的输入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

然后便是由严复翻译外国社会科学书籍，介绍外国新思想开始，进而到五四前后大量翻译介绍外国（特别是俄国和苏联的）文学作品的这一新时期。许多主要的马列主义理论著作也便在这一时期已经翻译过来，我们完全可以说后来的翻天覆地的革命运动从这里便已萌芽了！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我国开始进行翻译工作的初期，便已同时出现了一些有关翻译理论的论述，其中最重要的有东晋前秦时的高僧道安所写我国的第一篇翻译论文“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和隋代释彦琮的“辨正论”。

而且，我们可以说，许多我们在今天仍反复争论不休的问题在当时差不多已全部提出了。其中最著者如：

1. “直译”和“意译”之争：如原来主张“直译”的晋释道安已为北魏时主张“意译”的天竺僧鸠摩罗什（此人于公元四〇一年来到长安）所不取，而到了唐玄奘时期，玄奘本人对于鸠摩罗什“除繁去重”以“意译”方式所译出的许多经典更明确表示反对，并大都自己动手重新做出了新的译本。

2. 翻译标准：唐玄奘已首先提出了“既须求真，又须喻俗”^①的论点。这实际完全就是后来许多人反复论说的“既要通顺，又要忠实”的最早的版本；而且也可以说已触及到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所提出的“译事三难：信、达、雅”中的“信”与“达”两条了。

3. 翻译难：道安在他那篇长不满千字的序文中已直截了当地提出了翻译“五失本”、“三不易”的论点，甚至作了一个令人可怕的极为形象化的比喻：翻译的结果可能是“穿成而混沌终矣”！^② 鸠摩罗什也认为翻译往往“虽得大意”，“失其藻蔚”，结果“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人呕秽也”。^③ 释彦琮的“辨正论”也明确指出，“若令梵师独断，则微言罕革；笔人参制，则余辞必混……”^④ 世人

①见唐道宣《高僧传》卷五“释玄奘传”。

②意思说翻译得多么好也会显得毫无生气了。另外，这里所讲“五失本”问题，比较特殊，与我们今天的翻译关系似乎不大。该序全文见罗新璋编《翻译论集》第24页，可参看。

③见罗编《翻译论集》第32页。梁启超在论及此语时说：“推什公本意，殆持‘翻译不可能论者。’（见同书第60页。）

④这里所讲自然是中、外文由不同译者分别负责，彼此合作而实际又难于合作的情况。但问题的实质对于一个独自进行翻译的译者来说也可能仍然存在。简单地说，自然就是就了外文，中文有些不通，就了中文，又似有失原文涵义。

今语，传尚参差；况凡圣殊伦，东西隔域，难之又难，论岂能尽！”总而言之是说不尽的难、难、难！他这里对难的缘由只说了“凡圣殊伦，东西隔域”两条，而后人的一些说法，如“两种文字在形、音、文法、修辞、思考习惯、美感经验、文化背景上”全都是“如此相异”，因而翻译只能是一种“无可如何的代用品”^①等等，以及其它一些类似的说法，看来都可以作为彦琮的这段话的补充。

4. 对译者的要求：仍是这个释彦琮提出了他所谓的“八备”——实际也就是一个译者必须具备的八个条件。在这里，他提到，作为一个译者必须精通外文（“要识梵语”），必须知识渊博并有较高的中文修养（“旁涉坟史，工缀典词”），对所译作品内容必须全面掌握（“筌晓三藏，义贯两乘”）；而且此外对译者还提出了许多人品道德方面的要求，如“志愿益人，不惮久时；”“襟抱平恕……不好专执；”而且还要“淡于名利，不欲高衔”等等，真可说是十分完备了。所有这些，从精神上讲，无疑对今天的译者也都是完全适用的。

所有这些当然都是有关翻译一事的极关重要的问题。但这一时期以后在长约八百余年间似乎再也没有出现任何谈论翻译的较有份量的文章了。

然后，便是清末民初的两位影响较大的人物，马建忠和严复。特别是严复。马建忠是我国第一部语法书《马氏文通》的作者，他本人除具有较高中国古典文学修养外，并精

^①见刘靖之编《翻译论集》第127页（余光中：“翻译与创作”）。

通英、法文及希腊、拉丁文，于留法归国后一直任清使馆翻译，而且直接参预当时的所谓“洋务”，曾出使印度等国，对翻译一道似确有较深体会。不论如何，他在“拟设翻译院议”一文中提出的一些论点，至今仍甚有参考价值。特别对于译文的要求一点，他的说法是，“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失而后能使阅读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善译也已。”这和后来许多名家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

关于严复，大家当然都更为熟悉了。他的“信达雅”“三难”论，至今似乎还一直是大家争论不休的问题。

最后，还有一点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鲁迅先生提出的“宁信而不顺”和赵景深的“宁可错些不要不顺”的争论。

所有这些问题以及与此有关的其它一些问题，我们今天究应如何看待呢？这也正是本书在上编中打算一一加以探索的问题。

五、对我国目前英汉文学翻译现状的一点估计

解放后我国英汉文学翻译比解放前已有很大的进步，出现了更多译得比较成功的作品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这主要由于解放后出版事业，包括翻译作品的出版，完全被置于党和国家的统一领导之下，对译书选目有较精细的选择，对译稿质量有一个比较健全的审核制度，因而译所不当译，以及粗制滥造，译文质量低劣（包括听任译者只图自己方便任意删节或改写）的情况几乎已不存在了。也就是说，总的讲来，我们对待翻译普遍采取了比较严肃的态度，而在解放前，尽管也有不少译者，象鲁迅那样以十分严肃的态度对待